

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

陈秀兰 著

中华书局

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 比较研究

陈秀兰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 / 陈秀兰
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7

ISBN 978 - 7 - 101 - 06171 - 0

I. 魏… II. 陈… III. ①古典散文 - 语言学 - 研究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②汉语 - 佛经 - 语言学 - 研究 IV. I207.62 B94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3577 号

书 名 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

著 者 陈秀兰

责任编辑 方 颐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171 - 0

定 价 26.00 元

序 一

已经逝去的二十世纪的后期，在中国汉语言学尤其是汉语史的研究中，有两大宗材料格外引起重视，形成热点，至今方兴未艾，势头不减：其一是大量涌现的用古文字（主要是秦汉古隶）书写的出土文献；其二是存世已久的汉文佛典（即汉译佛经与本土佛经）文献。这两种材料的研究，为汉语言学的本体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加了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

即以汉文佛典而论，它源于印度，于汉末辗转来到中国，经过历代中外僧人辛苦移译，由于其自身性质与社会功能所决定，形成的文本中包括了三种主要语言成分：先秦以来保留的传统书面语即文言的成分、两汉魏晋逐渐产生的接近当世口语即白话的成分、由原始文本植入的外国外族语言的异质的成分。这种多元产生而浑然一体的复杂语料，即使在绵延数千年、篇幅亿万卷的中国传世文献中，也是不多见的。况且它本身已然是卷帙浩繁，足可作为资山宝海；因此汉文佛典引起语言学研究者的日益重视，正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

其中尤以产生于魏晋南北朝的汉文佛典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这是因为当时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中国尚未“本土化”，其经典的翻译转写工作正在草创动荡之中，尚未形成唐宋以后的较为固定的表达程式，故而较多地体现与保留了上述三种复杂的语言

成分，可资挖掘与探讨的语言现象相对也比较多。再就当代汉语史学研究与构建的现状而言，可以说存在着“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形局面，即对上古（秦汉以上）、近古（唐宋以下）阶段均有较多的力量投入，而中古阶段（大致即为魏晋南北朝）的研究相对薄弱，尚未形成足够的气候。这就难免使得我们对汉语史的概貌缺乏应有的全面的科学的认识。至今为止，我们尚未有描写细致、论述翔实的多卷本的汉语史通论著作问世，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种现状的制约。

所以，对中古汉语的研究予以更高层次的重视，对中古汉语的语料如魏晋南北朝时文及当时的汉文佛典加强调查与研究，是必要的，也将形成一种潮流。

作为“新生代”的年轻的汉语史研究者，在四川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浙江大学完成其博士后研究工作的陈秀兰女士，应该说是有志于此的一位“弄潮儿”了。这本《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就是她的博士后研究报告。

语料的研究角度是多方面的，有限的篇幅中难以面面俱到。本书只是在总括副词、部分常用词及新词新义这三个问题上对魏晋南北朝的俗世文献和汉文佛典进行研究，这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昭示的，本书运用的研究方法有二：其一是比较。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语言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语言现象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本书主要进行的是语言事实的比较。所使用的语料：俗世文约419万字，佛典文约420万字，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这就使比较所得的结论有可能尽量客观和准确。其二是统计。针对一定范围的穷尽性统计，将使由此产生的相关结论具有坚实的基础。在语言研究中大量采用数理统计，大大提高了语言学的实证性和科学性，现在已然受

到语言学研究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本书作者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还较多地设计和使用相关语言现象的变化趋势图,同一现象在不同的语料中体现的不同的变化趋势之间还可以进行必要的比较。凡此,无不有利于提高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当然,语言事实比较和穷尽性统计,首先需要投入大量的艰苦劳动,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对此当不难有深切的体会。所以我认为作者的治学态度是勤奋的,研究路子是正确的;循此以往,不懈努力,所成必然可观。至于本书中涉及的具体的语言事实比较以及相应的结论,内容俱在,无劳词费。

稍为可作补充的是:语言事实当然需要罗列,这是一切结论的基础;但是我們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对于语言事实的分析和解释。这已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又一个重要的追求目标和发展趋势。我认为本书的作者在这方面还可以作更多的挖掘,进行更深的思考。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第三章“常用词”的“詈/骂”一组,作者为我们提供的数据是(此处为排印方便,不列表):“詈”,魏晋南北朝文9次,魏晋南北朝佛典0次;“骂”,魏晋南北朝文13次,魏晋南北朝佛典189次。作者指出:“从表中可以看出,表示辱骂义,魏晋南北朝文主要用‘骂’(13),同期汉文佛典只用‘骂’(189)。”

其实,我们可以认为:“詈”和“骂”虽然都见于《说文》,而且不妨可以作为“互训”的好例子;但是在后世的实际使用中,“詈”一般只用于文言或书面语,而“骂”则多用于口语。从本书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骂”在魏晋南北朝文中使用13次,比“詈”多4次,可视为有增多倾向;同期佛典文则仅用“骂”不用“詈”(189:0)。早期(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典文

的口语性强于同期俗世文，这可以说已经是汉语史研究者的共识，因此上述数据表明了“詈”与“骂”在实际语用中的明显分化。

不知诸如此类的分析或解释是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汉语史有关现象和事实的认识？质之作者，以为如何？

是为序。

董 琨

谨书于2004年2月

序 二

2001年的夏天，操湖南口音普通话的陈秀兰博士来到杭州，说要到我这里作博士后研究。现在，她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修订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时间真快。

陈秀兰博士研究的是以东汉魏晋南北朝为主要阶段的中古时期的语言词汇，以往并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所以郭在贻师在评价这一时期历史词汇研究的现状时曾经说过：“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读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中国语文》1989年3期）当然，如果把目光放得远一些，早在三四十年代，著名学者吕叔湘先生就对《三国志》中的词语作过考释；他的《近代汉语指代词》也涉及了部分中古的称指代词；以史学名家的周一良先生也曾对六朝佛典中的词汇、语法作过研究，他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论佛典翻译文学》（中华书局，1963）一文中，曾结合佛典词汇语法实例，就佛典语汇对研究汉语史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参考价值作了富有启迪意义的阐述，这些都开了风气之先，但继之者寥寥。让人欣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成果的增多。以佛典语言词汇为例，一批中青年学者

迅速崛起,在拓宽汉语史研究领域、推进历时词汇研究向纵深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

现在,陈秀兰的这部著作即将出版,为中古汉语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我觉得这是一部有分量、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

本书选题有新意,突破了以往单一体裁的研究模式,富有开创意义。秀兰进入浙大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在和我商量后,很快就考虑并着手申请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六朝文与佛典语言比较研究》,计划在通读魏晋南北朝文及口语性较强的汉译佛典的基础上,就二者展开比较研究。六朝文是典型的文言系列的作品,佛典是口语性较强的宗教文献,各具研究价值。而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文和汉文佛典语言的比较研究,探讨两种不同性质的文献在词汇、语法方面存在的差异,探讨产生这些差异的规律和原因,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值得提倡。吕叔湘先生曾经指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要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就要跟古代汉语比较;要认识普通话的特点,就要跟方言比较;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可以通过对比来研究。”(《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1977年2期)。在汉语词汇史的比较研究领域,已有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例如,柳士镇先生(1988)曾就《世说新语》和《晋书》的异文语言做过比较研究^①。胡敕瑞曾就《论衡》与东汉佛典的词语做过

^① 参看柳士镇《〈世说新语〉〈晋书〉异文语言比较研究》,原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6期,收入作者《语文丛稿》64—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比较研究，撰写了题为《〈论衡〉和东汉佛经词汇研究》的博士论文^①。这样的例子尚不多见。显然，把不同类型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考察异同，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陈秀兰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土文献和佛典进行对比研究，体现了作者对学术发展方向的洞察力。

在具体的研究上，本书也有值得称道之处，表现为以下几点：

选择了独特的角度，作扎实的描写研究。作者选择总括副词、常用词、新词新义作为比较的对象，角度较新，视野独特。因为副词是介于实词和虚词之间的一类词，数量多，使用频率高，选择总括副词作为研究、比较对象，有一定的代表性。常用词属于基本词，常用词通常比较稳定，如果常用词变了，则意味着词汇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选择常用词作为比较对象，当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张永言、汪维辉先生的论文《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发表以及汪维辉先生《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出版后，关于常用词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成果不断增多。新词新义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产生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方面的情况尤其突出——产生了一大批新词新义。从数量上，从程度上，都适合作比较的对象。

在一定范围内作穷尽性调查，勾勒概貌，统计分析。在具体的描写研究方面，本书也作了尝试。例如，作者从总括副词、常用词和新词新义三方面进行比较，对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在

^① 参看胡载瑞《〈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台湾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2002年。

总括副词、10组常用词以及三国阮籍、嵇康文、《六度集经》中的新词新义作了穷尽性的调查研究，在总括副词一章，根据数理统计原理，运用统计学方法，考察了两种文献在总括副词方面的使用频率，统计数字，具有定量数据，这比单纯的分析、论述，自然更加可信。又如，在表述总括副词发展的时候，作者通过曲线坐标，勾画了两种文献中总括副词的变化趋势图，用图示的方式表明了词频发展的概貌，给读者以更加直观的感觉和印象。凡此，都说明作者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探索，对今后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启示性的作用。

章节安排上，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全书各章采用了先描写、分析，再小结，最后进行总结的方式。小结是单个词的特点概括，章节总结则是两种文献材料在某一方面的特点揭示。例如，作者把魏晋南北朝文和佛典分成三国、晋、南北朝三个时期，分别考察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总括副词，揭示了两种文献在总括副词使用方面存在的差异，包括：（1）总括副词的个数；（2）总括副词在三国、晋、南北朝三个阶段的个数；（3）总词频；（4）每一词的频率；（5）总括副词在三国、晋、南北朝三个阶段的频率；（6）词数的变化趋势；（7）词频的变化趋势；（8）词的组合形式；（9）词的变化趋势。（100—102页）又如，考察“大/独/极/绝/深/甚/太/特/尤/至/最/”一组程度副词，指出：表示程度深，魏晋南北朝文多用“甚”（899）、“至”（670）、“深”（608），汉文佛典多用“最”（2220）、“甚”（1689）、“大”（1294）、“极”（1094），且佛典使用表示极度副词的总词频大大高于魏晋南北朝文。（183页）凡此，都说明了本书所作过的扎实的研究工作，为研究结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作者所作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可资借鉴的成果很少，从

某种角度说尚是一种尝试，尽管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从更高的标准看，本书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还有很多工作可做。譬如，本书的描写是详尽具体的，也致力于探讨规律、阐释原因，但总起来看理论方面建树不丰，解释工作尚有加强的余地。又如，进行中土典籍和佛典的比较研究，究竟选择一个多大的比较的量（字数）较为合适，值得探讨。量过大，显然不利于作穷尽性的研究，当然也不宜过小。量小的好处是比较容易操作，但由于调查的面受到限制，得出的结论在可信度方面可能要打些折扣。还有，语言是一个系统，选择何种角度进行比较，如何比较，颇费斟酌。本文第四章讨论了新词新义，中土文献方面选取的是三国时代的阮籍、嵇康文，与之对应的是三国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前六卷的内容。作者先对两种文献的新词新义分别进行考察，然后就有关的数据得出两点结论：“（1）佛典新词新义的数量多于文”“（2）佛典新词新义见于后世文献的比例大于文”，略显笼统。然而说实在的，如果由我来承担这样一个大的研究课题，想必达不到本书已取得的高度，上面所说，近于苛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秀兰以本书为新的起点，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争取更大的成绩。

我知道，秀兰的成才之路并不平坦。她原是中师毕业生，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本科文凭。放弃了一般女性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常路，先是在 90 年代中期负笈成都，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从朱庆之教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前年又以在职人员的身份进入浙江大学博士后研究站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说，这么多年，凭着对汉语史研究的热爱和执著，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问学、治学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精进不已。功夫不负有心人，陈秀兰近年来在中

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后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等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出版了《敦煌俗文学语汇溯源》（岳麓书社，2001）、《敦煌变文词汇研究》（巴蜀书社，2002）两部专著，受到学术界的瞩目。我对陈秀兰的治学精神表示钦佩，愿意向她学习。就在这篇序言完成之际，我又欣喜地获悉，秀兰已经获得了教育部出国留学基金的资助，即将效仿古代玄奘和尚，远赴印度，去留学取经，学习梵文和佛教文化。治学如同登山，尽管道路漫长，多有险阻，但是，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终究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愿以此与秀兰共勉。

方一新

2003年12月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5)
第一章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	(1)
(一)两种文献的性质与差异	(1)
(二)比较研究的目的	(10)
(三)拟解决的问题	(13)
二、材料和方法	(14)
(一)研究材料	(14)
(二)研究方法	(16)
第二章 总括副词	(18)
一、单音节总括副词	(18)
(一)概况	(18)
(二)使用情况	(33)
(三)特点	(55)
二、双音节总括副词	(57)
(一)概况	(58)
(二)使用情况	(66)

(三)特点	(80)
三、三音节总括副词	(82)
(一)概况	(83)
(二)使用情况	(87)
(三)特点	(94)
四、两种文献在总括副词方面的特点	(96)
第三章 常用词	(100)
一、个案研究	(100)
(一)怖/惶/恐/惧/怕/悚/畏	(100)
(二)詈/骂	(117)
(三)空/唐/徒/虚	(120)
(四)目/眼	(126)
(五)燔/焚/然/燃/烧	(130)
(六)盈/满	(137)
(七)自/从	(144)
(八)大/独/极/绝/深/甚/太/特/尤/至/最	(150)
(九)许/听	(183)
(十)泪/涕/泣	(191)
二、两种文献在常用词方面的特点	(198)
第四章 新词新义	(202)
一、阮籍、嵇康文的新词新义	(203)
(一)阮籍、嵇康文的新词	(203)
(二)阮籍、嵇康文词语的新义	(224)
二、《六度集经》(1—6 卷)的新词新义	(229)
(一)《六度集经》(1—6 卷)的新词	(229)

(二)《六度集经》(1—6 卷)词语的新义	(270)
三、两种文献在新词新义方面的特点	(274)
第五章 结语	(276)
一、从比较研究看特点	(276)
二、探讨存在差异的原因	(280)
三、比较研究引发的思考	(281)
主要参考文献	(284)
引用文献	(292)
后 记	(298)

第一章 绪 论

一、选题缘起

(一) 两种文献的性质与差异

1. 魏晋南北朝文是典型的文言文文献

魏晋南北朝文^①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将近三百年间的帝王诏令、奏章、表疏、书信、各类文人著述，内容涉及国家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语言多带有事务性的风格，多用有郑重、客气、尊敬的态度色彩或礼仪格调色彩的词语。即使是文学作品，其语言也颇典雅，多承接秦汉，与此前的正统文献比较接近。如：

(1) 兵欲作陈，对敌营先白表，乃引兵就长而陈，

① 三国魏晋南北朝文收录了 2417 人的著述，共 12683 篇。其中，①诏令类 3275 篇，包括诏、令、策、教、敕、制、册、下书等；②奏疏类 2190 篇，包括奏、表、上书、上言、上事、疏等；③论议类 1348 篇，包括论、议等；④书信类 1100 篇，包括书信、杂贴等；⑤赋类 974 篇；⑥其它 3796 篇，包括墓志、铭、赞、传、文、序等。